

「五四」小說中的基督教色彩

• 楊劍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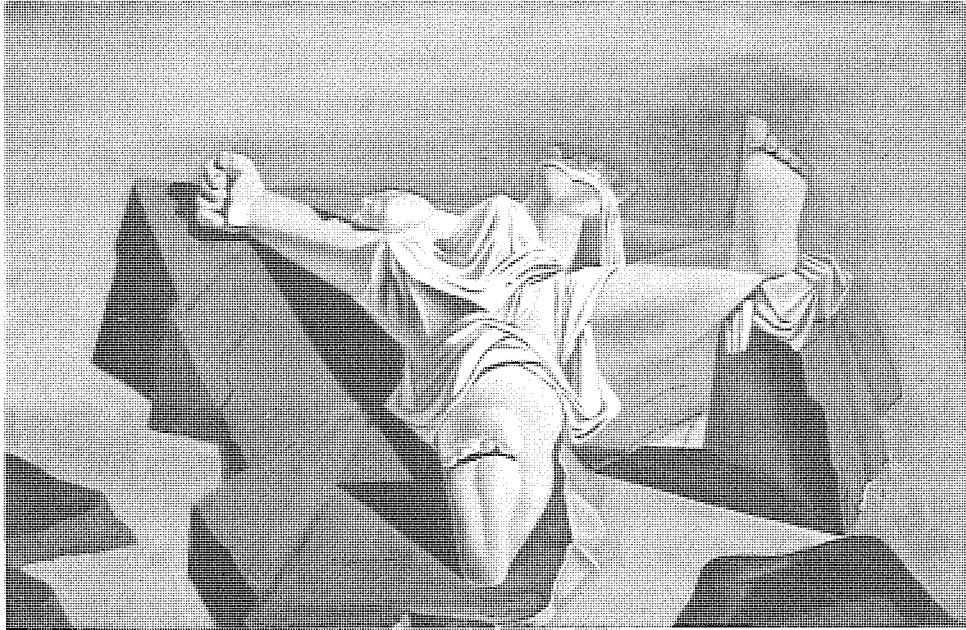
要全面考察中國現代小說的生成和發展，不能忽略基督教文學的影響：要全面考察「五四」小說的風貌和內涵，不能漠視基督教文化的滲入^①。

基督教對五四文學的影響

《聖經》對西方文學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它為西方作家提供了大量的創作素材、人物原型、藝術技巧和思想觀念。中國現代作家不似西方作家津津於從《聖經》故事中取材，雖然也有向培良的〈暗嫩〉取材於《舊約》中大衛之子暗嫩熱戀妹妹他瑪的情節，徐志摩的〈卡爾佛里〉取材於耶穌被害的情景，朱雯的〈逾越節〉取材於猶大賣主的故事，但「五四」小說創作中所受基督教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五四」小說家對基督徒生活的描寫、對《聖經》詞語典故的借用、對《聖經》人物原型的模仿、對基督人格精神的弘揚。

「五四」作家對基督徒生活題材的

熱衷，這種現象在「五四」以前的中國文壇是鮮見的。「五四」作家對基督徒生活的描寫大致有幾種題材取向：一是細致地描寫教會的醫生、護士和修女的生活，努力刻劃他們的慈愛善良的美好形象。如王統照〈微笑〉中對罪犯比母親還細心的教會女醫生，石評梅〈禱告〉中精心照料慰藉病人的女護士，廬隱〈餘淚〉中修道院裏聖母般純潔慈愛的白教師，在這些人物身上滿溢着基督的博愛精神。二是生動敘寫皈依者曲折坎坷的人生歷程。如許地山的〈商人婦〉中經歷了「久別、被賣、逃亡」等痛苦的惜官，廬隱的〈或人的悲哀〉中想遊戲人間卻為人間所遊戲的亞俠，王統照的〈十五年後〉中因解剖少婦新鮮屍體而受刺激飄溺海中的秋士，他們都在人生的苦痛生涯裏皈依了基督，求得心靈的平衡與拯救。三是細膩剖露基督徒複雜矛盾的內心世界。如張資平的〈梅嶺之春〉中「一毫不苟的基督教徒」吉叔父卻和侄女發生了曖昧關係，滕固〈石像的復活〉中埋頭研究基督教的宗老，內心卻湧



基督教的象徵，在西方文化中影響深遠。

動着神性與情慾的衝突，郁達夫的〈南遷〉中憂鬱厭世的伊人以「心貧者福矣，天國為其國」的教義自慰，這些作品都努力寫出人物心靈深處人性與教義、情感與倫理、靈與肉的衝突。在對基督徒生活的描寫中，「五四」作家常有自己獨特的題材選擇，許地山常着意敘寫基督徒以坦然執着忍惡勿抗的精神面對多難的世界；王統照常孜孜於描繪迷途羊在救世主的感召下成聖稱義悔罪盡善；廬隱常努力抒寫主人公在精神彷徨無着處時尋求聖主的救贖接引；張資平常力圖揭示教人悔罪背人作惡的傳教士的偽善卑劣。「五四」作家對基督徒生活題材的關注與描寫，使「五四」小說具有濃厚的基督教色彩。

倘若說唐宋時期由於佛教在中國的繁盛，唐宋詩文中引用佛教詞語典故成為一時之風氣的話，那麼「五四」時期由於《聖經》文學的影響，「五四」作家引用基督教詞語典故也成為屢見不鮮的現象。上帝、耶穌、聖母、基督、天國、煉獄、懺悔、祈禱、天使、撒旦、洗禮、福音、耶和華、十

字架、伊甸園、替罪羊等詞語常常出現在「五四」作家的筆下，甚至常常構成作品中極具基督教色彩的意象。廬隱的〈一封信〉敘寫聰慧純樸的農家女梅生在債主的摧殘虐待下悲慘死去的故事。小說結尾作者寫道：「哀號的聲音，漸漸微弱，還餘着些許斷續的呻吟聲，如此支持了一夜，直到第二天的陽光重照到這個破屋子來的時候，那微弱的小羔羊面上露着笑容，因為她已經離開這污濁世界、人間地獄，到極樂園去了！」這裏的羔羊、地獄、極樂園等詞語都出自《聖經》，而離開污濁世界進入極樂園的描寫，取自於基督教聖徒獲得救贖進入天國的意象。郭沫若的〈喀爾美夢姑娘〉中將主人公眷戀着的賣喀爾美夢的姑娘，比作在「一種聖潔的光中生活着的」聖母瑪麗亞，將主人公舊地重遊說成「我並不期望會遇見她，只是她在的地方是我的聖地，巡禮耶路撒冷的信徒，並不是期望着要會見那耶穌」。此中的聖地、耶穌、聖母瑪麗亞、耶路撒冷也都是基督教用語，作者以富有基督教色彩的意象作比喻，

倘若說唐宋時期由於佛教在中國的繁盛，唐宋詩文中引用佛教詞語典故成為一時之風氣的話，那麼「五四」時期由於《聖經》文學的影響，「五四」作家引用基督教詞語典故也成為屢見不鮮的現象。

將戀情表現得更加濃烈真摯。蘇雪林的〈綠天〉描寫一對厭惡塵囂的夫婦對水木清華的清靜之地的嚮往，作品描畫了綠草叢生、古樹掩映、人獸同憩的地上樂園的圖景，「隱約有一男一女在那裏閒步，那就是人類的始祖」，這裏以〈創世記〉伊甸園的典故，抒發作者的人生理想。張資平的〈她悵望着祖國的天野〉中描寫留學生H從女主人公秋兒處得到性的滿足後，「望着秋兒的睡顏便聯想到《舊約》的〈撒母耳下篇〉第十三章第十五節」，作者借用大衛的兒子暗嫩玷辱了美貌處女他瑪後「恨她的心比先前愛她的心更甚」的典故，勾畫始亂終棄者的卑劣靈魂。

《聖經》中刻劃了許多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五四」小說家的創作也常受到《聖經》人物的影響，張資平的〈約伯之淚〉描寫大學生「我」對女同學璉珊未能如願的苦戀，作品用書信體的形式以《聖經·約伯記》中的有關章節構成小說的支架，從主人公受盡磨難的人生經歷中，似乎可聯想到眾叛親離備受折磨的約伯的形象。冰心的〈最後的使者〉描寫天外翩翩飛來的雙翅雪白的嬰兒，挾着金斧在詩人面前回翔歌唱，這翩翩飛翔的「希望的使者」顯然取自於上帝的使者的原型。郭沫若的〈聖者〉將天真無邪的孩子當作「天國裏就是最大的」聖者來描寫，冰心的〈超人〉把夢中的慈母當作聖潔慈愛的聖母來描畫，都具有《聖經》人物的原型意味。冰心的〈悟〉、〈煩悶〉、〈世界上有的是快樂……光明〉等小說，都以極具基督教聖靈意味的形象，使受難者掙脫黑暗的束縛，獲得光明的啟悟。郭沫若的〈歧路〉、〈煉獄〉、〈十字架〉等作品，都以極富基督教色彩的意象為標題，着意抒寫

「不完全的信徒」在人生煉獄中孤苦貧困的漂泊生涯。

「五四」時期，陳獨秀極力推崇耶穌的偉大人格和深厚情感，將其概括為：崇高的犧牲精神、偉大的寬恕精神和平等的博愛精神；並將此看作「將我們從墮落在冷酷、黑暗、污濁坑中救起」的捷徑^②。「五四」作家是在徹底批判、否定中國封建傳統的文化斷層上，爭取對基督教文化有選擇地認同和接受，拋棄基督教具有神秘意味的宗教傳說和枯燥乏味的教義，在他們筆底着意抒寫、張揚基督的犧牲精神、寬恕精神和博愛精神。廬隱〈餘淚〉中的修女隻身上前線勸說上帝的兒女們切勿互相殘殺而飲彈身亡；王統照〈微笑〉中的教會醫生，任勞任怨地給女犯看病，使毒死丈夫的惡毒女囚變成了寧靜和美的婦人；石評梅〈禱告〉中的女看護無私地關照病篤的失戀者，這些擔負着上帝的使命尋找與拯救失足之人的主人公，身上都充滿了基督的犧牲精神。冰心的〈一個軍官的筆記〉中受傷致殘的軍官臨終前對主戰者與敵手的寬恕，許地山〈綴網勞蛛〉中篤信耶穌的尚潔對受傷竊賊與行凶丈夫的寬容，都洋溢着基督的寬恕精神。冰心〈最後的安息〉中去別墅消夏的惠姑，對受盡折磨的鄉村童養媳的憐愛關懷，葉聖陶〈潛隱的愛〉中命運悲慘的婦女，對鄰居孩子的全心愛撫，都蘊涵着基督的博愛精神。

基督教傳播和現代中國作家

公元七世紀始傳入中國的基督教，在一千多年漫長而坎坷的傳教過程中時乖命蹇，始終未能出現與老莊

之學相融匯的佛教的興盛氣候。基督教傳入我國後，唐朝、元代、明末曾出現過三期傳教高峰，以後卻不斷出現反教風潮。明清之際經過傳教士利瑪竇、羅明堅、湯若望、鄧玉函、馬禮遜等的努力，尤其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五口商埠的開放，在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下，外國傳教士紛紛湧入中國，設立教區進行傳教活動。他們創辦了許多教會學校、教會醫院、孤兒院等慈善機關，教徒人數日益增多。據1923年中國基督教教會年鑒報告：「基督教在全國1073縣中，沒有佔據的只有126縣，其餘都樹了基督教的旗幟。」^③20年代初基督教在中國的信徒總數達200多萬，教會學校學生總數已有245,049人^④。

由於基督教在中國的勢力日益強大，許多中國現代作家不同程度地受其影響。冰心受過四年教會學校貝滿女中的教育，以後她回憶中學生涯時說：「我所得的只是英文知識，同時因着基督教義的影響，潛隱地形成了我自己『愛』的哲學。」（《冰心全集·自序》）廬隱九歲就被送進教會學校，在慕貞學院度過五年時光，以後她在自傳中寫道：「我的母親不愛我，我的兄弟姊妹也都拋棄我，我的病痛磨折我，……我這空虛的心，在這時便接受了上帝。」（《廬隱自傳》）郁達夫曾是教會學校蕙蘭中學和之江大學（預科）的學生，後來他提醒世人：「我們不要把伊甸園內天帝吩咐我們的話忘了。我們要用汗水去換生命的日糧，以眼淚來和葡萄的美酒。」（《創造日·宣言》）張資平1906年即進教會學校廣益中西學堂學習，後來他借作品中人物之口說：「我覺得基督教的教義在各種宗教中總算是比較純正的，比較好的。」（《寇拉梭》）

五四前後，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為探求救國救民之路紛紛出國留學，在異國的土地上他們受到更濃郁的基督教環境的影響。留法的蘇雪林成了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並認為「基督教的神卻是活潑，無盡慈祥，無窮寬大，撫慰人的疾苦……」^⑤；留美的陳衡哲詳盡地考察研究了基督教的歷史，後來發表了論文〈基督教在歐洲歷史上的位置〉；留日的郭沫若民國五、六年寄居異國時，每天把「新舊約全書當做日課誦讀」^⑥；涉足於緬甸、美國、英國、印度的許地山，孜孜於宗教的研究，由早年的篤信佛教轉為皈依基督，並認為「宗教當使人對於社會、個人，負歸善、精進的責任」^⑦。這些現代作家在教會學校和基督教環境的耳濡目染中，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基督教的影響，為五四時期

本世紀20年代，中國的基督徒已達二百多萬。圖為手拿《新約全書》中譯本的教會人士。



出現的具有基督教色彩的小說，奠定了思想、生活和情感基礎。

伯樂里德談到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時指出：「我想基督教傳入中國已經很久，卻不能獲得中國文人學者的信仰，其原因，就在初次翻譯聖經的時候，不注重文學上的價值。」^⑧這道出了最初的《聖經》漢譯本漠視文學價值的遺憾。1891年底，在狄考文、富善等人的主持下着手重譯工作，終於在1919年初出版了官話和合譯本《新舊約全書》，該譯本以其譯文的準確審慎、行文流暢上口被公認為標準譯本。這部在五四運動前夕出版銷數以百萬計的白話《聖經》，對於我國新文學白話文運動的興起與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重要作用，因為「基督教聖經的翻譯，為要使一般平民都容易明瞭，所以譯文極其明白淺顯，可以為白話的模範」^⑨，同時對於基督教思想在五四時期的進一步傳播起了毋庸置疑的影響和作用。周作人曾在〈聖書與中國文學〉一文中說：「我記得從前有人反對新文學，說這些文章並不能算新，因為都是從〈馬太福音〉出來的：當時覺得這話很是可笑，現在想起來反要佩服他的先覺，〈馬太福音〉確是中國最早的歐化的文學的國語，我又預計它與中國新文學的前途有極大極深的關係。」^⑩「五四」小說中呈現濃厚的基督教色彩，五四前夕《聖經》白話譯本的出版發行不能不說是其原因之一。

「五四」時期，為了救國救民，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紛紛探索國富民強的道路，他們提出了教育救國、科學救國、藝術救國等各種良策，其中也有宗教救國的呼聲。宗教救國論受到了陳獨秀、蔡元培、恽代英、胡適等人的竭力反對，引起了一場關於宗教

問題的論爭，許多人提出以教育代宗教、以美育代宗教、以科學代宗教的觀點。1920年底至1921年初少年中國學會在北京、南京召開了宗教問題講演會，還出版了宗教問題專號。在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向西方學習的社會思潮中，西方的基督教在中國受到了比其他宗教優惠的待遇。一些竭力反對宗教救國論的有識之士，也將基督教的神學迷信方面與其內涵的博愛精神崇高人格予以區別，在對基督教的重新審視中以「拿來主義」的態度呼喚對基督偉大人格崇高精神的擁抱。認為宗教「在今日且不足道」的恽代英明確指出：「基督與他的愛，是一件東西：基督教與他的迷信，又是一件東西。」^⑪田漢在給友人的通信中說：「弟近又研究Biblical Literature（聖經文學——筆者注），有好些喜歡的地方，並且有點愛Christ那種偉大崇高的人格呢。」^⑫有人甚至在基督精神和「五四」新文化運動間劃上了等號，認為「這文化運動的內容，當然是要提倡耶穌所教給我們的人格，一句話包括，便是熱烈的博愛精神」^⑬。有人還建議將《聖經》當作文學作品讀，從而使基督精神，「深入人民的感情生活」^⑭。

在對基督的偉大人格和精神的推崇倡導中最有影響的是陳獨秀，雖然他在1918年發表的〈偶像破壞論者〉中指出：「一切宗教，都是一種騙人的偶像：阿彌陀佛是騙人的，耶和華上帝也是騙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騙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無用的騙人的偶像，都應該破壞！」但他在同年發表的〈科學與基督教〉一文中卻認為「然純粹原始基督教之倫理的價值，即『愛之宗教』在文明史上有高尚之勢力，固與神話的

伯樂里德指出，基督教傳入中國卻不能獲得中國文人學者的信仰，其原因，就在初次翻譯聖經的時候，不注重文學上的價值。

周作人曾說：「我記得從前有人反對新文學，說這些文章並不能算新，因為都是從〈馬太福音〉出來的：當時覺得這話很是可笑，現在想起來反要佩服他的先覺。」

教義不相關」。這就將基督教的倫理價值與神學教義截然區分開了。發表於1920年2月《新青年》的〈基督教與中國人〉突出地推崇耶穌的偉大人格和深厚情感，他認為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在於「一方面偏於倫理的道義，一方面偏於美的宗教的純情感」，指出「中國底文化源泉裏，缺少美的、宗教的純情感」，「這正是中國人墮落底根由」，他提倡拿美和宗教來利導我們的情感。他說：「我以為基督教是愛的宗教，我們一天不學尼采反對人類相愛，便一天不能說基督教已經從根本崩壞了。基督教底根本教義是信與愛，別的都是枝葉。」他主張拋棄舊信仰，另尋新信仰，這新信仰就是「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他提倡將其「培養在我們的血液裏：將我們從墮落在冷酷、黑暗、污濁坑中救起」。介紹基督談論基督逐漸成為「五四」文壇的熱點。《小說月報》革新後的第一期第一篇文章即是周作人的〈聖書與中國文學〉，《新潮》於「五四」前後刊出了江紹原的〈最近代基督教義〉、〈耶穌以前的基督〉；鄭振鐸發表了〈聖經的故事〉^⑮，葉啟芳翻譯了〈聖經之文學的研究〉^⑯；周作人撰寫了〈舊約與戀愛詩〉^⑰，徐玉諾刊出了〈與現代的基督教徒〉^⑱。基督人格和基督精神當時被當作拯救、復興中華民族的一劑良藥，這使「五四」作家的小說創作中呈現出濃厚的基督教色彩。

「個人」和悲劇的出現

由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們對基督偉大人格和深厚情感的竭力推崇，由於「五四」作家對基督教文化

精神的有意識的選擇接受，也由於受西方文學中人道主義思想的影響，「五四」文壇上對人道主義的推崇和倡導大多帶着基督教的色彩。文學研究會在〈文學研究會叢書緣起〉中指出：「我們覺得文學是決不容輕視的。……他是人生的鏡子，能夠以慈祥和諧的光明，把人們的一切階級，一切國種界，一切人我界，都融合在裏面，用深沉的人道的心靈，輕輕的把一切隔閡掃除掉。惟有他，能夠立在混亂屠殺的現世界中，呼喚出人類一體的福音，使得壓迫人的階級，也能深深的同情於被壓迫的階級。」這種超越了「一切階級、一切國種界、一切人我界」的人類一體的福音的呼喚，顯然受到了基督教思想的影響，具有基督的博愛精神。

創造社在〈創造日宣告〉中號召：「我們要存謙虛的心，任艱難之事。我們正在拭目待後來的替民眾以聖靈施洗的人，我們正預備着為他縛鞋洗足。現在我們的創造工程開始了。我們打算接受些與天帝一樣的新的創造者，來繼續我們的工作。」雖然創造社作家的思想帶着否定一切偶像的泛神論色彩，但宣言中對「替民眾以聖靈施洗的人」出現的虔誠企盼，顯然帶着基督教的色彩，希望能喚起民眾的醒悟。新潮社提出新的道德標準，提出「注重人道主義」，「以平等博愛諸道德實行之」，倡導「發達個人之利己心」，「尊重個性之獨立」^⑲。少年中國學會提倡創立理想的「少年中國」，認為要達此目的「必須本着人道主義精神，宣傳互助博愛的思想，以改造現代中國墮落的人心，使每個人都拿出『人』之面目來對待自己的同胞」^⑳。這些對人道主義精神的倡導，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響。

雖然創造社作家的思想帶着否定一切偶像的泛神論色彩，但宣言中對「替民眾以聖靈施洗的人」出現的虔誠企盼，顯然帶着基督教的色彩。



冰心深受基督教「愛」的哲學的影響。

中國小說走向現代化的標誌之一是中國現代小說完成了從寫事為主到寫人為主的轉變，在這轉變途中，具有基督教色彩的「五四」小說作出了不可忽略的貢獻。徐國楨曾在〈小說學雜論(五)〉一文中指出：「從古典到近代的一大批短篇小說或章回小說，其『大概方針』，都不過是『注重於事實的離奇，情節的曲折』。」^②重故事重情節而輕人物輕性格，這種傳統傾向在重視人的覺醒的「五四」時代受到人們的反對。與強調修身的儒家學說不同，基督教並不像孔孟注重個人的自我完善反身而誠，它強調的是考慮自我靈魂的拯救，基督教的原罪感和對彼岸世界的企盼，使基督徒內心充滿着難以消解的靈魂搏鬥和情感衝突。「五四」作家常以基督教虔誠懺悔般的敘述模式，展示人物激烈的內心衝突，坦現人物的內在人格，例如郭沫若的〈落葉〉、王統照的〈十五年後〉、石評梅的〈禱告〉、張資平的〈約伯之淚〉、許地山的〈商人婦〉、冰心的〈一個軍官的筆記〉、廬隱的〈或人的悲哀〉等等。在具有基督教色彩的小說中，一些不用懺悔般的敘事模式的作品，也着力寫出人物內心的矛盾衝

突，刻劃人物性格的豐富生動，具有基督教色彩的「五四」小說為中國小說從寫事為主轉向寫人為主的現代化進程，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

中國傳統文學中缺少嚴格意義上的悲劇，「五四」時期文學先驅者們紛紛反省，批評中國古典悲劇觀的不足，呼喚文壇出現真正的悲劇。魯迅抨擊中國傳統的「曲終奏雅」的晦和騙的文學，呼喚「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淚來」的悲劇^③。胡適反對中國古典團圓主義的「說謊文學」，認為只有悲劇觀念才是「醫治我們中國那種淡漠作偽思想淺薄的文學的絕妙聖藥」^④。冰心呼籲「應當努力寫出你們中的悲劇，因為我國今日正要這種東西」^⑤。廬隱大聲疾呼企盼悲劇作品的出現，因為「慘淒苦痛的事情則無人無之，所以這種作品至易感人，而能引起人們的反省」^⑥。與儒家和老莊的寫美追求不同，被稱為罪感文化的基督教認為人生而有罪，它把痛苦視作原罪的苦果，只有經過痛苦的贖罪才能獲得拯救。「五四」作家對基督教文化和精神有選擇的接受和認同，使他們的小說創作擺脫了中國傳統的大團圓的格局，溢出悲劇的

與強調修身的儒家學說不同，基督教強調的是靈魂的拯救，具有基督教色彩的「五四」小說，為中國小說從寫事為主轉向寫人為主的現代化進程，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

色彩。具有基督教色彩的「五四」小說中，有的描寫主人公背着十字架犧牲自我拯救他人（廬隱〈餘淚〉、冰心〈一個不重要的軍人〉、郭沫若〈落葉〉）；有的敘述受洗者用聖主的愛心去寬恕仇敵愛人如己（冰心〈一個軍官的筆記〉）；有的描寫罪孽深重的迷途羊在人生煉獄中的坎坷經歷（許地山〈商人婦〉、冰心〈最後的安息〉、廬隱〈淪落〉）；有的敘述人生戰場的失意者，在十字架下的皈依中抱着重病奔赴彼岸世界（廬隱〈或人的悲哀〉、張資平〈約伯之淚〉、郁達夫〈南遷〉）。這些具有基督教色彩的「五四」小說，或悲壯、或悲婉、或悲涼、或悲鬱，匯成一股獨具特色的悲劇流脈，促進了中國現代作家悲劇意識的生成，推動了中國現代悲劇小說的創作。

結 語

基督教文化不僅使「五四」作家的思維方式、情感趨向、價值觀念發生了變化，而且對「五四」小說創作的敘事方式、語言色彩、藝術形式、主題表達等方面都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和作用。《聖經》中的象徵、隱喻、誇張、夢幻等藝術手法，也為「五四」小說家所模仿採用，形成了「五四」小說創作絢爛多姿的藝術風貌，奠定中國小說走向成熟的基礎，為中國小說通往現代化跨出了扎實的一大步。

- ② 陳獨秀：〈基督教與中國人〉，《新青年》，卷7，3號。
- ③ 《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3集，頁61。
- ④ 轉引自〔美〕H·史密斯：〈從世界的觀點透視中國的宗教〉，《國外社會科學》（1989），第9期。
- ⑤ 綠漪：《棘心》（北新書局，1929）。
- ⑥ 郭沫若：〈太戈爾來華之我見〉。
- ⑦ 許地山：〈宗教的生長與滅亡〉。
- ⑧ 伯樂里德：〈佛教在中國〉，《佛教與中國文化》（上海書店，1987）。
- ⑨ 王哲甫：《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上海書店，1986），頁22。
- ⑩ 《小說月報》（1921），卷21，1號。
- ⑪ 惲代英：〈我的宗教觀〉，《少年中國》，卷2，8期。
- ⑫ 田漢：〈少年中國與宗教問題〉，同上。
- ⑬ 包世杰：〈基督教問題〉，《新青年》，卷7，5號。
- ⑭ 董紹明：〈聖書作文學讀的建議〉，《語絲》，58期。
- ⑮ 《小說月報》，卷15，2期。
- ⑯ 《小說月報》，卷13，10期。
- ⑰ 《新青年》，卷8，5期。
- ⑱ 《文學周報》，卷3，49期。
- ⑲ 俞平伯：〈我之道德談〉，《新潮》，卷1，5號。
- ⑳ 李大釗：〈「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
- ㉑ 徐國楨：〈小說學雜論·五〉，《紅玫瑰》，卷5，14期。
- ㉒ 魯迅：〈論睜了眼看〉。
- ㉓ 胡適：〈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
- ㉔ 冰心：〈中西戲劇之比較〉。
- ㉕ 廬隱：〈創作的我見〉。

具有基督教色彩的「五四」小說，匯成一股獨具特色的悲劇流脈，促進了中國現代作家悲劇意識的生成，推動了中國現代悲劇小說的創作。

註釋

- ① 聞一多在〈文學的歷史動向〉一文中已提到基督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見《聞一多選集》（四川文藝出版社，1987），卷1。

楊劍龍 1952年出生於上海。1987年畢業於江蘇省揚州師範學院中文系，獲碩士學位。現為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